



秦西垂陵区

礼县博物馆

礼县秦西垂文化研究会

文物出版社

K878.85
Z917

秦西重陵区

主 编 祝中熹

副主编 张奎杰 王 刚

文物出版社

封面题字 徐祖蕃
摄影(部分) 王 刚
装帧设计 张奎杰 张有文
责任印制 梁秋卉
责任编辑 李缙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秦西垂陵区 / 礼县博物馆, 礼县秦西垂文化研究会编
著.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4.11
ISBN 7-5010-1630-5

I. 秦... II. ①礼... ②礼... III. 陵墓—考古发掘
—礼县—秦代(前221~前206) IV. K878.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第 060069 号

秦西垂陵区



礼县博物馆
礼县秦西垂文化研究会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五四大街 29 号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圣彩虹制版印刷技术有限公司印刷
889 × 1194 大 1/16 印张: 10.5
2004 年 11 月第一版 2004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0-1630-5/K · 834
定价: 168 元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司跃宁

副主任

南玄子 任登宏 李树杰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忠惠 王友平 王 刚 王建补 李 斌 张志义

张奎杰 张晓峰 何德未 祝中熹 贾利民 康世荣

主 编

祝中熹

副主编

张奎杰 王 刚

工作人员

张东成 赵 娟 李文义 王战胜 赵小鹏



序

《秦西垂陵区》这部书的出版，正适应了学术界当前探索早期秦文化的需要。

今年3、4月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组成一支联合考古队，在甘肃礼县至天水的西汉水流域进行系统调查，重点了解当地早期秦文化的分布，以及其与戎人寺洼文化并存的状况，为进一步研究早期秦文化准备了基础。由于秦在古代历史进程上曾起有巨大影响，这方面工作的重要性可谓不言而喻。

看《史记》的《秦本纪》，秦的先世出自颛顼，到商代晚期的中湣，已经“在西戎，保西垂”。西周中叶，非子居于犬丘，为周孝王在汧、渭之间养马立功，得为附庸，封邑于秦。同时，非子之父大骆的嫡子成仍居犬丘。西周晚期厉王时，西戎反叛王室，攻灭了大骆一族。宣王即位，以非子的曾孙秦仲为大夫，伐西戎，不幸战死。宣王又命秦仲之子庄公(名其)等五人再伐西戎，取得胜利，于是将犬丘也赐给庄公，为西垂大夫。犬丘(或称西犬丘)与秦，是秦最早的都邑所在。

1919年，在天水西南乡出土了不少青铜器。其中有一件著名的秦公簋，流传到兰州商贾手中，为收藏家合肥张氏所得，运至北京，轰动一时。1923年，王国维撰《秦公敦跋》(当时多称簋为敦)，对这件青铜器作了考释。他正确地指出，西垂地名本来泛指西部边境，后来则专指西犬丘，其地即汉代的西县，在今天水西南60公里。天水秦公簋的出现和王国维的研究，第一次为西汉水流域秦文化提出了线索。结合文献所述非子所封的秦邑在今清水东北，可以知道西汉水这一带乃是秦的发祥地。

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弟子冯国瑞有一本书题为《天水出土秦器汇考》，收入《陇南丛书》。书中继承王国维的端绪，讨论了秦公簋，还记述了天水南乡1944年秋季发现的车坑出土的青铜饰件。这批器物现在看是西周中期的，是秦公簋之后的又一项重要线索。

近年，把学术界的眼光再次吸引到这一地带来的，是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陵墓的发现。

大堡子山墓地在1992至1993年间惨遭盗掘，造成大量珍贵文物流失。有关部门采取措施，缴获了一部分。1994年3至11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礼县博物馆做了清理发掘，有很大收获。

秦公陵墓流散的文物，不少到了境外。最早为人所知的，是1994年春韩伟先生于法国巴黎戴迪野(Christian Deydier)行见到的一批黄金饰件，照片刊在同年11月该行的《秦族黄金》图册。同年，我和艾兰(Sarah Allan)教授也在《中国文物报》介绍了美国纽约拉利(James Lally)行出现的一对秦公壶。散出的青铜器还有许多，国内上海博物馆，国外如日本的美秀(MIHO)博物馆等所收都很重要。上海博物馆李朝远先生等学者作过综合论述。



大堡子山 M2、M3 两座并列大墓之属于秦公室，由所出青铜器多有“秦公”铭文即足判定。这些器物，形制、纹饰和组合等方面都表现出两周之际，即西周末至东周初的特点，从而铭文里的“秦公”应当不出庄公、襄公、文公的范围。如学者所论，庄公称公有可能是追称，襄、文两公又有葬于西垂的明文可稽，大墓划归后者是更合理的。

想进而论证两座大墓的具体归属，遇到了一些困难。已经看到的有铭青铜器，很难在类型学上截然分作早晚，哪些件出自哪一座墓也无法证明。况且从晋侯墓地的实例知道，前一代国君所造器物有时也出于后一代的墓中。如果其中有一座是夫人墓，情形更是如此。然而多数学者认为这两座墓中一座属于襄公；另一座是襄公夫人，还是文公，则尚存争议。

最近我们知道，在流散的青铜器里，还有少数礼乐器、兵器有“秦子”铭文，这应该是秦君受封诸侯称公以前的称号，与襄公的情况相合。

与大堡子山墓地大致同时，隔河相望的圆顶山墓地也遭到盗扰。礼县博物馆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帮助下，1998 和 2000 年作了清理发掘，结果表明这里是春秋早期以至战国的秦国贵族墓地。圆顶山盗掘的青铜器也多有流散，但因缺少特征性的铭文而不易辨识。

现在，当进一步开展这一地带早期秦文化遗存的发掘和研究之前，除了要尽快发表前一阶段调查、发掘的报告外，有一项大家迫切需要的工作，就是将大堡子山、圆顶山已知的出土文物材料汇集辑录起来。《秦西垂陵区》这部书就是因此编著的。

这部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祝中熹先生的论文，不仅对大堡子山、圆顶山墓地的发现和发掘清理工作做了详细的概述，对两地点出土的器物有逐一的描写，而且把文献与考古成果结合起来，深入讨论了与发现有关的种种问题。文中广征博引，在综述已有各家看法的基础上，提出一系列的独到见解。特别是关于大堡子山 3 号墓为襄公墓，2 号墓为文公墓的论点，值得专门注意。第二部分图版，将两墓地出土器物尽可能搜罗在一起，为今后研究提供了便利。第三部分附列礼县境内所出的相关器物，也足供今后参考。编者的辛勤，我们应当感谢。

相信《秦西垂陵区》这部书会博得关注秦历史文化的读者广泛欢迎，并对将来这方面的工作起重要的促进作用。

李学勤

2004 年 8 月 1 日



目 录

序·····	李学勤 2
秦西垂陵区·····	祝中熹 1
一 嬴秦与西垂·····	2
1. 嬴秦的族源与西迁	
2. 嬴秦的崛起与西垂地望	
二 大堡子山秦公陵园·····	7
1. 陵园的发现与清理	
2. 出土器物	
3. 关于墓主	
三 圆顶山秦贵族墓地·····	18
1. 墓地发掘概况	
2. 墓地的时代与性质	
3. 出土器物	
四 结语·····	28
图版壹	
大堡子山秦公陵园出土器物·····	31
图版贰	
圆顶山秦贵族墓地出土器物·····	59
附录	
礼县境内所出与秦文化相关器物·····	125
散出秦器	
商周及巴蜀文化器物	
寺洼文化器物	
收录器物表·····	152
后记·····	编者 158

秦西垂陵区

祝中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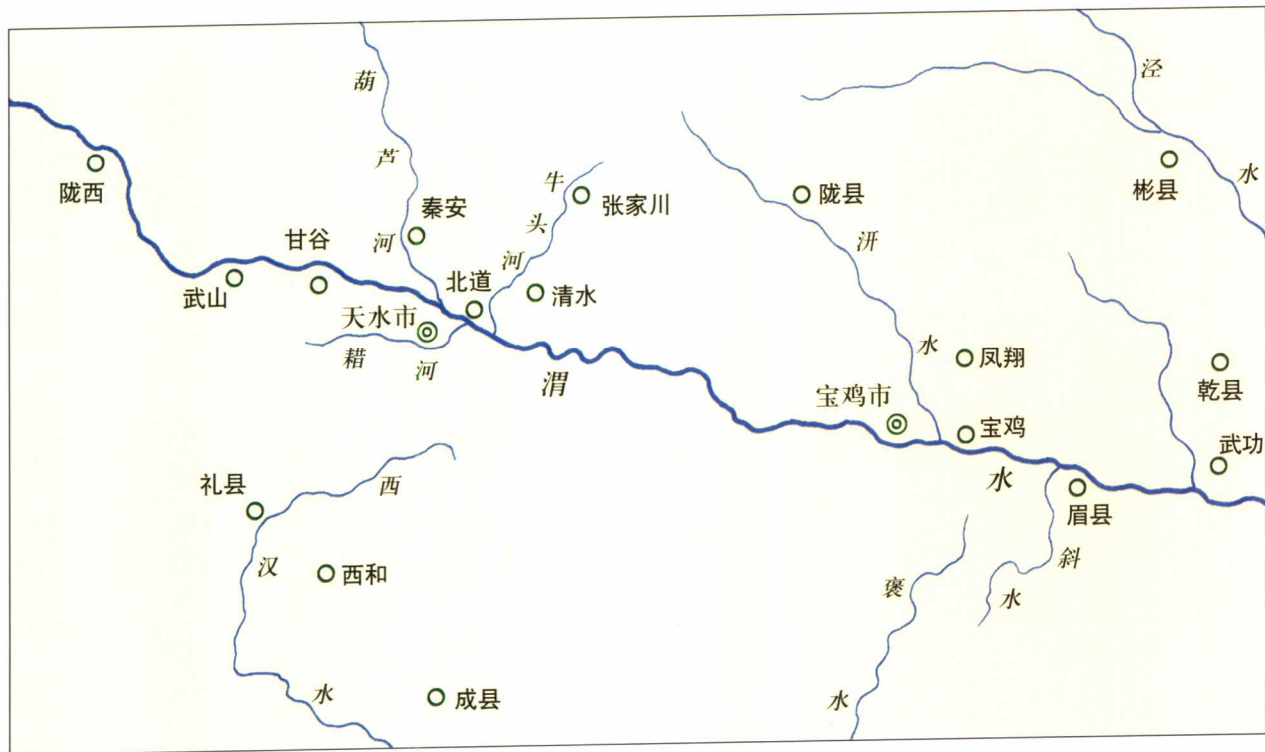


一 嬴秦与西垂

1. 嬴秦的族源与西迁

近代以来，关于秦人族源，学界流行“西方戎狄说”和“来自东夷说”。后一说实际本于《史记》，《秦本纪》开篇云：“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这个大业便是秦人有世系可寻的男性始祖，族源上溯至五帝时代的高阳氏颛顼。凤翔秦景公大墓所出石磬，铭中有句曰：“天子匿喜，龚赳是嗣。高阳又灵，四方以霸。”石磬为景公行冠礼亲政时祭祖祭天之物，铭文祈求始祖保佑秦境安宁。^[1]这表明秦人的确奉颛顼为祖神。女脩的故事是个典型的鸟始生神话，显示嬴秦族以鸟为图腾。所以，先秦文献又说秦人是少昊的后裔。《史记·封禅书》载，秦开国之君襄公任诸侯后所做首件大事，便是“自以主少皞（昊）之神，作西畴，祠白帝”。少昊是以河岱地区为活动中心的东方嬴姓鸟图腾部族的总首领，由于嬴秦崛起为西方唯一的诸侯大国，他也便演化成了以白色为表征的西方之神。主张嬴秦本即西方戎狄的学者，不相信《史记》关于嬴秦远古世系的记述，认为那是强大之后的秦人对祖先的美化，这种看法缺乏根据。

时代越早，人们的族源、祖系观念越重，对本族之所出的母族和始祖看得越是神圣。马克思说过：“氏族名称的职能，在于使这一名称全体成员，保持共同的世系的记忆。”^[2]史前社会的先民，不会忘记自己的族源和祖系，不会放弃本族图腾而改奉异族的图腾。即使到文明时代，在宗法制度和祭祀传统的支撑下，祖先崇拜仍长期占统治地位。文物考古工作也没有给秦人戎狄说提供支持。嬴秦世代与关



秦人早期活动地域范围

[1] 王学理、梁云《秦文化》，第154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

[2] 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第172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



陇诸戎接触、交往，乃至通婚、杂居，在民风族俗方面相互影响和渗透是必有现象，但秦文化的主流，却无疑应属华夏文明体系。除了葬习中的西首葬(可能是在漫长西迁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有特殊寓意的葬式)为秦文化所独具外，我们很难举出嬴秦文化风貌同中原地区有本质的不同。曾一度被视为秦文化三大特征的洞室墓、屈肢葬和铲脚袋足冢，如今已证明都不是秦文化固有的因素，它们和嬴秦族源没有必然的联系。分布在陕西西部和甘肃东部早于或相当于嬴秦活动时代的几种古文化类型，如先周文化、刘家文化、城固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等，考古学界已基本厘清了其性质和特征，它们中没有任何一种类型可与秦文化的面貌相对应。^[1]

五帝时代是我国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时期。中原地区各主要部族和部落联盟，正展开激烈的分化、改组与并合，孕育着雏形期的国家。种种迹象表明，颛顼部族和少昊部族是两个互为婚姻的族体，它们构成彭那鲁亚群婚体制下的“两合部族婚姻联盟”，是华夏族的主体成分之一。嬴秦族是它们的后裔，把始祖追溯到颛顼和少昊，正合乎远古时代群体记忆的规律。

嬴秦既属东方部族，那就存在一个西迁问题。上世纪后20年间，学界对嬴秦西迁的时间和原因曾展开过讨论。段连勤先生的看法影响较大，他认为东夷集团的吠夷，在夏末与殷商组成反夏联盟，进军关中，他们就是后来活跃在泾渭流域的犬戎族。而秦人，是吠夷的一支。据《春秋》和《左传》，至迟在春秋时期，东方也有地称犬丘又名垂(今山东曹县境)者；嬴秦都邑西垂又名西犬丘，实乃对应东方的同名地而言，这是随吠夷族西迁从东方带过去的地名。^[2]段先生关于吠夷西迁以及西垂地名的考证无可置疑；但说嬴秦是吠夷的一支，则可商榷。吠夷是个以犬为图腾的部族，这有文献中存在大量该族的犬始生神话为证，它和以鸟为图腾的嬴秦不可能有共同的族源。嬴秦长期定居于西垂地区，具有农业、畜牧业相结合的经济形态；而吠夷也即后来的犬戎却过着侵掠性较强的游牧生活，从陕北到陇东到西汉水上游，到处有他们流动的踪迹，二者的文化基质存在巨大差别。而且，嬴秦和犬戎一直处于势不两立的敌对状态，围绕西垂地区展开过世代相继的反复争夺，假如他们属同一部族，这种现象便很难解释。至于西垂、犬丘的地名，确实是吠夷从东方带过去的，因为西迁后的吠夷也曾在那里长期生活过。但这地名和嬴秦没有必然联系，那个居邑最古老的名字称“西”，嬴秦一直是使用“西”这个邑名的。既然嬴秦并非吠夷的分支，那便不能用吠夷的西迁说明嬴秦的西迁。

据《秦本纪》载，嬴秦和殷商关系密切，不少嬴秦首领担任商王朝的大臣，“嬴姓多显，遂为诸侯”。到商后期，嬴秦首领中湣，“在西戎，保西垂”。有的学者据此认为秦人就在这时西迁，动因是受商王朝之命，到西戎活跃地区去保卫商的边疆。^[3]但《秦本纪》从中湣时代详述秦事，并不一定意味着秦人在中湣时代才西迁。商代国家形式是盟邦性质，并行“内服”、“外服”体制，王畿之外均为大小宗属国，不存在严格的国土疆界，更无须派人去防守。商后期王畿之西域日渐强盛的周方国，是商王朝统率西方宗属国的盟主，即所谓“西伯”。怎么能设想商王会派一族人越过周境，跑到陇山以西去“保卫”边疆呢？尽管商文化曾伸延至泾、渭流域，但即使在商王朝的全盛期，政治上也未曾控制过关中。至于陇山以西，连周人也并不视为自己的国域，更无须说殷商了。

《尚书·尧典》有一段尧命羲和四子分居东、西、南、北四极以测日、祭日的记载。观测天象，确

[1] 牛世山《对秦文化渊源与秦人起源探索》，《考古》1996年第3期。

[2] 段连勤《关于夷族的西迁和秦嬴的起源地、族属问题》，《人文杂志·先秦史论文集》，1982年；《犬戎历史始末述》，《民族研究》1989年第5期。

[3] 林剑鸣《秦史稿》，第二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定季节,颁布历法,授民以时,乃部落联盟及早期国家首领的首要任务,因为这是群体赖以生存的农业、畜牧业的绝对需要。早就有学者指出,《尧典》所述四中星的时位,是分别在山东东部、湖南长沙以南、甘肃境内和北京一带实地测量的结果。^[1]李学勤先生也说过,《尧典》“所述四中星,据近年学者推算,颇能与唐虞时期符合,有天文学史方面著作推测‘其上下限当在距今3600年到4100年之间’”。^[2]这就是说,当年羲氏、和氏四支族人是落实了尧的分工而定居于四方之测日、祭日点的。肩负“寅饩纳日”使命的和仲一族迁居于“西”地,《禹贡》述“岷、嶓既艺”之后言“和夷底绩”,讲的就是和仲一族对西汉水中上游地区的经营。汉唐诸儒一致说,和仲一族所居之“西”,就是汉代陇西郡的西县,也便是嬴秦最早的都邑西垂。羲和是重黎的后代,而重、黎又属颛顼的族系;羲和四子的职司又和《左传》昭公十七年所载少昊集团中“凤鸟氏”一族对四季历法的职司完全相同,这绝非偶然巧合。笔者曾据此提出了关于嬴秦西迁的一种新说,认为嬴秦实为和仲一族的后裔。^[3]问题在于《尧典》、《禹贡》所述同后来嬴秦的史事之间,存在太大的历史断层,故此说尚有待文化考古领域的验证。

2. 嬴秦的崛起与西垂地望

至迟在商后期,嬴秦已在西垂地区建立了一个宗属于商王朝的小方国,商亡后又臣服于周,成为周王室联结西部诸戎、稳定陇右局势的一支重要辅助力量。周孝王时,嬴秦首领大骆有个庶子名非子,以善于养马著称。那正是王室需用大量马匹的时候,孝王便召非子到“汧渭之间”(今宝鸡以西)去为王室繁殖马匹。非子畜马有功,深得孝王赏识,为表彰其勋劳,孝王让他以王室“附庸”身份从大骆族体中分出,别祖立宗,封邑于秦地。所谓附庸,指王畿或诸侯国内领有一小块土地的政治实体,依附于王室或公室,地位低于封邑之大夫。非子封地就在他为王室牧马的“汧渭之间”,该地原本即有“秦”之名。“秦”字初义是一种可酿造优质酒的禾类作物,非子封地可能盛产这种禾,故禾名也便成了地名。此后“秦”之名便始终伴随着非子一族的发展历程,由邑名而族名,而国名,而朝代名,其禾之本义遂渐消失,只在许慎《说文》中微留其迹。^[4]

非子一族在汧渭间生活的时间并不很长,那一带与畿外众多氏邦相邻,民族关系非常复杂。当西周王朝趋于衰落时,实力尚弱的嬴秦便难在该地立足。估计在厉王时代,这支嬴人西登陇坻,转移到今甘肃张家川、清水一带,利用渭水河谷较好的自然条件,凭借陇峰之幛护,暂时摆脱了民族冲突的险恶漩涡,使族体获得了较稳定的发展,原汧渭间秦地之名也随之移到陇上。非子的曾孙秦仲,治理陇上秦地业绩显著,王室晋升其爵为大夫。文献中有不少赞誉秦仲的记载,王室史官史伯曾将秦仲与齐侯并举,评曰:“夫国大而有德者近兴。秦仲、齐侯,姜、嬴之隽也,且大,其将兴乎?”^[5]郑玄《诗·秦风·谱》也说:“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焉。”足见秦仲时代陇上之秦的昌盛给人们很深的印象。

正当秦仲一族繁荣于陇上时,西垂地区的大骆本族却被戎人灭掉了。周宣王即位后,大力扶植秦仲一族,讨伐西戎。不料秦仲兵败被杀,戎势难遏。秦仲虽死但后继有人,决心与戎族周旋到底的周宣王,把以庄公为首的秦仲5个儿子召集起来,“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6]7000人在当时堪称大军,

[1] 姜亮夫《古史学论文集·尧典新议》,第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2]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第147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

[3] 祝中熹《阳鸟崇拜与“西”邑的历史地位》,《丝绸之路·学术专辑》,1998年。

[4] 祝中熹《地域名“秦”说略》,《秦文化论丛》第七辑,1999年。

[5] 《国语·郑语》。

[6] 《史记·秦本纪》。



秦西垂陵区墓葬位置示意图

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战役。结果周、秦联军取得了胜利，并且收复了已被戎人占领二三十年的西垂地区。从此，陇上秦域和大骆祖地连成一片，大幅度扩展了嬴秦族的活动范围。秦庄公就势把都邑移回西垂，全面取代了原大骆一族的地位。

襄公即位后成功地缓解了一次戎祸危机，西垂地区渐趋稳定。公元前771年，周王朝政局突变，各种社会矛盾的积累和激化，终于导致了申侯之乱，犬戎入侵，幽王被杀。危难时刻，秦襄公将兵救周，为扭转局势作出了贡献。《秦本纪》载，新立的周平王在东迁洛邑时作出了一项重大安排，“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文公即位第4年，把都城迁往关中西部的汧邑，迈出了国势东拓的关键一步。文公十六年，军事上取得了对戎人的决定性胜利，“收周余民有之”，完全控制了岐、丰地区。兹后秦人承袭王畿先进农业和手工业基础，再度繁荣了关中经济。秦都也随着国力的增长而不断东移，凭借日益强劲的军事力量，积极参与列强逐鹿中原，秦国开始进入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全面发展的新时代。

西垂地区是嬴秦成长、壮大的摇篮。嬴秦以辛勤的劳动开发、富庶了这片土地，也为保卫、收复它付出过血的代价。通过与周边方国、部族的长期交往、沟通、冲突和融合，嬴秦不仅吸收了异族文化的优秀成分，而且锻炼、培育了族体坚韧不拔的英武气质。秦文化所具有的兼容性、功利性和开拓性，就是在西垂地区孕育成熟的。一部东周史，由秦国升封为诸侯而开篇，又由秦国统一九州而掩卷，成功这一伟业的基石，早在西垂时代即已奠定。

前文言及，西垂即《尧典》所言之“西”，也即两汉时陇西郡的西县。西县方位文献中有相当一致的记载，都说它在水西南方60公里处，境内有蟠冢山，有西汉水。这样我们确定西垂地望便有据可依。蟠冢山，《禹贡》、《山海经》等先秦文献曾多次述及，是上古时期影响很大的一带山系，即今天水市南部靠近礼县境的齐寿山。西汉水，今为嘉陵江上游，发源于齐寿山西麓，入礼县境后南下再东折，



大堡子山秦公陵园远眺

入陕会嘉陵江。东汉以前嘉陵江尚未形成时，它与汉水通连，是汉水上游两大支流西面的一支，故称西汉水(东面一支称东汉水即古漾水，为今发源于齐寿山东麓南贯徽县入嘉陵江的永宁河)。综合诸多史籍和地志考察，西县境域大致含今礼县东部及西和县北部，即西汉水上游地区。而西县县治也即西垂故邑，当在祁山以西不远处西汉水与西和河(古建安水)交汇点附近。几乎所有的礼县县志以及涉及礼县的州志、省志，都说礼县古称“天嘉”，有的甚至直接说秦时在今礼县东境设过天嘉郡或天嘉县，其邑址被称作“天嘉古郡”，晚至元、明仍在那里有军政建置，其具体位置在今礼县城东 20 公里处。据此推测，当在捷地村与红土嘴附近。当地传说那一带古时曾有邑镇，后来毁于山体滑坡。地方志和民间传说中的“天嘉古郡”位置，正在西汉水与西和河原先的交汇处，正是文献记载的西县故城即西垂邑址所在。西汉水在这一带形成了一块相对开阔的小盆地，即永兴川。汉魏时期的卤城即今盐官镇，乃盆地的东大门；被魏文帝视为军事要塞之一的祁山，雄踞盆地北岸；南麓陡峭三面临水的大堡子山，扼控盆地的最西端。城内河谷纵横，川原肥美，农畜两宜，又盛产井盐，确是古代部族兴邦立邑的理想之地。《水经注·漾水》述西汉水流经祁山脚下后接言：“上下有二城相对，左右坟塋低昂，丘山被阜。古谚云：南岬北岬，万有余家。诸葛亮《表》言：祁山去沮县五百里，有民万户。矚其丘墟，信为殷矣。”描述的就是这片盆地。所言上下二城，即指西县城和戎丘城。

秦西垂陵区的发现，为西垂邑址地望确定提供了新的可靠依据。大堡子山秦公陵园西距我们推断的邑址约 5 公里，正是秦人葬域同国都之间的通常距离。《史记》所言秦襄公和秦文公死后入葬之“西山”，应就是大堡子山。



二 大堡子山秦公陵园

1. 陵园的发现与清理

大堡子山位于永兴川最西端的西汉水北岸，永兴、永坪二乡的交界处，西距礼县县城约13公里，因其西端高处有一清代修筑的土堡围而得名。礼县至天水徐家店的公路绕经山腰，北面是一片广漠的茆塬，由北而南的固城河沿其西麓山脚注入西汉水，大堡子山正在二水所形成的夹角处。被岁月积尘覆盖了2700余年的秦公陵园，就坐落在山南麓高处向阳的缓坡上。

西汉水流域纵跨南北地理分界线，属于阶梯地形的过渡区。远古时这一带气候温润，水源充足，森林密布，极适宜生物的栖息繁衍，因此留下了丰富而多样的古生物化石。当地居民称那些不时从地下挖出的化石为“龙骨”，据说可以入药治病。上世纪80年代，有人在农闲时寻挖“龙骨”，使一些古墓葬在无意中被发现，一些文物贩子闻风而至，致使盗墓之风迅速蔓延。1993年前后，大堡子山古墓被盗掘，几座大墓和许多中、小型墓葬被洗劫一空。不久，所出器物陆续出现在纽约、伦敦、巴黎、神户和香港、台北等地。在严重的盗墓事件发生后，各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在严厉打击文物走私活动的同时，政府拨出专款，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礼县博物馆，对大堡子山陵区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清理。1994年3月开始至11月结束，勘探面积21万平方米，发掘土方1.7万多立方米，共发掘清理目字形大墓(M3)1座，中字型大墓(M2)1座，车马坑(M1)1座，以及中、小型墓葬9座。各墓均为东西向的西首葬。两座大墓南北并列，目字形墓在北，相距约40米。中字形墓以南，有东西



大堡子山秦公陵园近景

两座车马坑，已发掘清理的K1为东面一座。陵园约东西长250、南北宽140米。除中心部位为上述两座大墓和两座车马坑外，在北部、东北部和西部，还有规律地分布着200多座中、小型墓葬，其间距5~7米，均被严重盗扰。在陵区东侧，发现有一道从坡底部伸向顶端山嘴的分土遗迹，断续的残存显示可能是一条茔域的兆界。陵园正上方有夯土台基遗存，附近发现不少秦瓦及瓦当残片，表明那里曾经有过陵寝之类的墓上建筑。两座大墓和两座车马坑非常紧凑地集中在一个不大的方域内，组成依山坡地形统一规划的完整陵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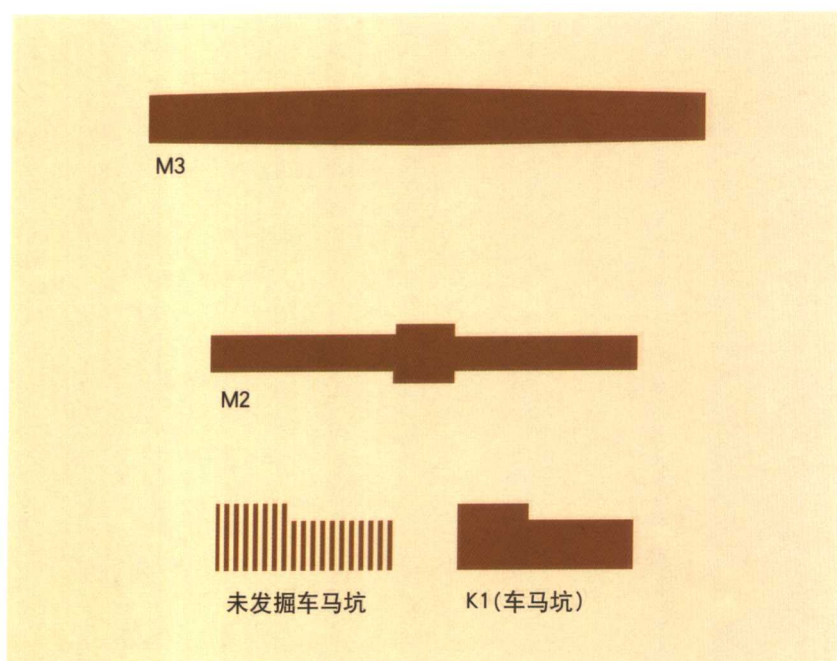
日字形大墓(M13)全长115米。东墓道为主墓道，斜坡式，端宽8.30、长48.85米；西墓道为台阶式，端宽8.20、长41.50米。墓室呈斗状，口长24.65、宽9.80米。底长6.75、宽3.35、深16.50米。墓葬形制比较特殊，曾被视为中字形墓。但墓室与墓道交接处并无折棱，墓室口也没有外扩成中字形的迹象。墓室南壁历史上曾发生过坍塌，其北壁则与东西墓道壁连接为一线，只是墓室处略显弧突。墓室内设二层台，东、南两侧台面被严重盗扰，北侧台上现存1殉人。木椁漆棺，墓主骨骼已朽，为仰身直肢葬，头西向，胸、颈部位残留散乱的琥珀珠。棺下有腰坑，内殉狗1只，玉琮1件。西墓道填土中殉7人。由于墓室发生过坍塌，随葬器物有的被砸碎，故墓室内有许多铜器碎片。其他随葬器物已被盗空。

中字形大墓(M12)全长88米。东墓道为主墓道，斜坡式，端宽6、长37.90米；西墓道大致为斜坡式，但有8个沟槽状台阶，端宽4.50、长38.20米。墓室呈斗状，口长12.10、宽11.70、底长6.80、宽5、深15.10米。墓室内设二层台，东、北、南三面台上共殉7人，均为直肢葬，有的有漆棺，多随葬有小件玉饰。木椁漆棺，棺周围残留盗余的金饰片，椁室内有罐、鬲等陶器碎片，以及铜泡、戈、刀



等残器。墓主骨骸已朽，为仰身直肢葬，头西向。棺下有腰坑，内殉狗1只，玉琮1件。西墓道填土中殉12人，狗1只，殉人均为屈肢葬，头向东、西皆有。骸骨表明有杀殉和生殉，多为青少年。其中3人各随葬玉块1件。其他随葬器物已被盗空，仅在盗洞中发现石磬5件。

车马坑(K1)为瓦刀形，全长36.50米，东西向。坑道在东，长21.85、宽9.50米，坡状倾斜至坑



大堡子山秦公陵园墓葬位置示意图



目字形大墓 (M3) 发掘情形



底。坑长方形竖穴土坑，长14.65、宽12.95、深5.40米。据盗扰后的遗迹判断，坑内原殉车4排，每排并列3乘，每乘两服两骖，皆辕东舆西。发掘后仅清理出盗余的个别青铜和一些大小不等的铜泡，另有锈蚀严重已不明其形制的铁制品。

中、小型墓葬9座，较为完整。皆东西向，竖穴土坑，长2~5.20、宽1.40~2.70、深3.10~7.60米。有棺槨，头西向，直肢葬。随葬器物有铜器、玉器、陶器、石器等。除随身佩带的小件饰物外，主要随葬器物置放于棺槨间西端头箱内。铜礼器鼎、簋配置不甚规范，流行使用仿铜陶礼器。陶器常见组合为喇叭口罐、鬲、盆、豆等。时代似较大墓要晚。^[1]

2. 出土器物

大堡子山陵区虽遭盗扰，考古发掘清理的随葬器物收获甚微，但一些文博单位通过各种渠道，征集了该陵区所出的部分器物。另有流失海外的一些器物已经发表披露。现将该陵区所出器物的已知信息作一概要介绍。

① 金器

A. 金饰片。数量最大，也最为重要，其中一部分曾在巴黎展出，并在伦敦出版的图录上发表，

[1] 本文所述陵区墓葬资料数据，除礼县博物馆提供者外，多采自戴春阳《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及有关问题》一文(载《文物》2000年第5期)。